

文化中国行 走进专题博物馆

水运连着国运， 水治则邦兴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水利与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文明息息相关。浙江杭州钱塘江南岸，中国水利博物馆园区飞鸟翔集，绿树葱郁，碧水荡漾。

远远望去，博物馆主体建筑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水晶宝塔。塔顶，“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拱卫的巨型龙钮印章镌刻着《史记·河渠书》，“水利”一词由此出，展示着中国水利文化的源远流长。

走进博物馆，如同走进了水利文化的宝库，从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到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将中华民族治水、治国的故事娓娓道来……

人类逐水而居， 文明伴水而生

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

步入中国水利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6幅大型铜浮雕壁画，大禹治水的场景，震撼人心。来自湖北的观众于媛媛伫立良久。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蹻，山行即桥……”《史记·河渠书》是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简要叙述了从上古至秦汉的水利发展情况，记述正是从大禹治水的故事开始。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远古发生大洪水的神话或传说，不少都说洪水毁灭了人类，仅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于媛媛从小就对中外治水故事有浓厚兴趣，她说，“顺应天时地利，洪水被我们伟大的祖先征服了，开启了华夏文明新的篇章。”

中国水利博物馆展览陈列处副处长魏晓明说：“不论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还是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以及‘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智慧，大禹治水都值得中华民族世代传颂。”

文化如水，水脉亦文脉。实际上，比大禹治水的历史更早，在长江流域已出现治水范例——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距今约有5000年历史，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灿烂辉煌。

中国水利博物馆与浙江大学文保团队合作，取样制作了良渚遗址老虎岭段的大坝剖面——“护国之堤”。通过技术处理，远古的草裹泥工艺被完整展示，参观者啧啧称奇。

在良渚古城遗址上，东苕溪穿城而过。东苕溪上游依天目山，是浙江省暴雨中心，山高岭峻，坡陡流急，加之下游河道泄水能力不足等原因，洪涝灾害频繁。“水利系统从北面和西面围绕良渚古城，规划和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取水之利、避水之害，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魏晓明介绍，“它也证实良渚古城是由内而外具有宫城、王城、外郭和外围水利系统的完整都城结构。”

良渚人奠定了江南生活模式。他们把房子建高，堆土墩子，避免被水流的同时，堆墩所需的土方，挖出来形成了河道、池塘，河网密集，水稻就能种在村子周围。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考古项目领队王宁远表示：“可以把良渚作为中华早期文明研究里的一个教科书式的样本。”

良渚古城遗址定格了时间，实证着文明历史。而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

中国水利博物馆大运河展厅墙上的一幅《四省运河水利源流河道全图》长卷，绘制于1855年，详细记录了大运河杭州至北京沿线的城市、河道、水闸等情况。运河打破空间阻隔，缩短时间，哺育城镇，功莫大焉。

中国人适应空间地理、利用自然山水，不断求知、探索和创造，沟通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等水系，形成我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济命脉，推动了沿岸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

“至今千里赖通波”“共禹论功不较多”，古人诗句对大运河的赞扬，凸显了其在水利文化史中的价值。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千百年来，运河滋养着两岸城市和人民。如今，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持续推进，京杭大运河连续三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大运河沿线各类文化自然遗产保护基本实现全覆盖，千年运河名片更加璀璨，大运河文化带、生态带、旅游带正在焕发新活力。

中国水利博物馆展现壮阔图景

护水脉兴水利 续文脉惠民

本报记者 郑海鸣

成立以来，高度重视治水。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到“一定要根治海河”，从学大寨整地治水到发扬红旗渠精神凿山修渠，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治水事业蓬勃发展，水利文化广泛弘扬。

红旗渠主题展览现场，陈列着大锤、镢头、洋镐等简易工具，而展板上介绍的“削平山头1250座、开掘隧洞211个、全长70.6公里”等惊人数据，让观众看后感佩不已。

来自杭州富阳区的何欣雨一家专程驾车1小时来到博物馆，作为80后，“从小就听到很多水利工程的建设历程，对红旗渠记忆深刻，那时什么高科技都没有，就靠一股子精神，改天换地！”

何欣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说：“周末带孩子来这里看看，受教育。今天物质生活大为改善，但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

自古以来，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毛主席提出了宏伟构想。

兴修水利，造福人民。一把满是水垢的烧水壶、一壶清澈的水样，直观展现了南水北调给沿线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变化。过去，沿途有的地方“自来水能腌咸菜”。如今，清甜甘甜的引江水替代了北方某些地区的苦咸水、高氟水。

跨水跨山、跨省跨市，供水、防洪、排涝、航运、生态……既讲人定胜天，也讲人水和谐，南水北调不愧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受益范围最广的调水工程。截至今年3月18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量突破700亿立方米，受益人口超1.76亿，已经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

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存环境之危、民族存续之危。“我们要大力增强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重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中国水利博物馆馆长、党委书记陈永明说。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史记·河渠书》中用较大篇幅描述了汉武帝亲临今河南濮阳县西南的瓠子口指挥封堵黄河决口这件事，太史公做出了“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感慨。

博物馆展板上的西汉“治河赏”陶罐是汉代先民治理河道的见证物，当时用来表彰治河有功的人员。

“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史记·河渠书》中用较大篇幅描述了汉武帝亲临今河南濮阳县西南的瓠子口指挥封堵黄河决口这件事，太史公做出了“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感慨。

黄河自古“多淤、多决、多徙”“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封建社会战争和军阀混战时期，更是人为导致黄河决口12次。新中国成立至今，黄河实现70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24年不断流，先后抵御12次大洪水，创造“地上悬河”治理奇迹。

水治则邦兴。汉武帝作《瓠子歌》嗟叹黄河洪水之危害；唐太宗亲自整顿治水机构，制定水利与水运的专门法规；清圣祖“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靡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祈愿着大河安澜。

“民国时期，水利先驱们曾为系统开展流域治理奔走谋划，但因时局和国力所制未能贯彻落实，各流域的工程实践以灾后修防为主。”魏晓明介绍，“从1840年到1949年的百余年里，外侮内乱，国力衰退，水利失修，水旱灾害与社会动乱形成恶性循环。”

河清海晏，国泰民安，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当历史的大潮越过1949年，江河湖海面貌为之一新。

既讲人定胜天，也讲人水和谐

兴水利、除水害，古今中外，都是治国大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中国



图①：“水文化进百校”活动走进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竞湖小学。
中国水利博物馆供图
图②：游客在展区参观。
周方玲摄（影像中国）
图③：中国水利博物馆外景。
中国水利博物馆供图
版式设计：张丹峰

人文茶座

放慢脚步，品读城市

黄超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历史与现代在此交汇。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块砖石，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的蕴含某个历史片段，有的见证城市更新，还有的寄托了无数人的记忆和情感。

近年来，城市漫游广受青睐，在这个“露天博物馆”中，人们徜徉于街头巷尾，感受城市的气息，体验文化的韵味，探索发展的脉搏。不少地方准确把握城市漫游的人文气息，适时推出特定主题的文化探访路线，为当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带来契机，也孕育了新生活新业态新时尚。

城市漫游，人们往往会避开人流量大的旅游景区，深度体验历史人文景观，沉浸其中。在杭州，宋代文人墨客无论是怀古思幽，还是呼朋引伴，往往“自净慈南屏下天竺过灵鹫，遂游灵隐而归”，这段路线被后人视作经典游览线。彼时，文人雅士一时兴起在山崖石壁留下的题刻，成为今人城市漫游的“攻略”。古与今对话，雅与潮碰撞，让人与城市的情感深度关联。

如今，南京民间文物爱好者组建“城市记忆民间记录团”，用脚步丈量四季芳华；“漫步北京”胡同街巷探访路线亮相，为市民、游客打开首都文化之旅的新视角……城市漫游串珠成链，不仅是空间上的联结，更是时间上的延伸。从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人们深入每个承载历史记忆的角落，

仿佛踱过文化的长河，打捞中华民族智慧的珍珠。由此，当前城市治理、文化建设等工作也面临新的课题。

一方面，作为现代人生活工作的聚集地，城市发展是变动不居的，近年来不少地方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对此，要扩大城市文脉保护范围，增强人文底蕴。不仅保护老宅、古街等承载城市记忆的人文硬底蕴，还应尽量尊重城市内在肌理，保留传统邻里关系和熟人社会结构，保护方言、习俗等人文软底蕴。

另一方面，城市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随着时代的进步，古老建筑与摩天大楼映衬，传统戏曲与现代街舞同台，城市不断吸收各种文化元素。漫游其中，可以真切感受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亮丽风景。不妨借助漫游的东风，践行城市人文经济学，提高历史文化资源的造血能力，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逐步推动人文价值充分展现。如，注重空间联动，有机串联零散资源，引入创意年轻化消费新场景。再如，探索建设文化驿站等小而美空间，融旅游、阅读、展览等服务于一体，让城市漫游焕发新风尚。

城市的面貌，既是其历史赓续的见证，也是文化建设的载体。现代人之所以喜爱城市漫游，根本在于这里是文化传承发展的沃土，能从中找到归属和认同。让我们放慢脚步，品读城市韵味，从中获取精神力量和文化滋养。

传承

赵莉：走在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路上

本报记者 李亚楠

克孜尔石窟内，赵莉（见右图）对着壁面上的切割痕迹，与电脑里的数百张照片来回比对，题材内容、颜色、纹饰图案，都要一一对应。突然，脑海中一张照片精准镶嵌进了缺失的那块壁画——这样的“灵感实现”，源于她对每个洞窟每幅壁画以及被揭取痕迹的熟悉程度。在克孜尔石窟群穿梭了32年，作为克孜尔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每一个洞窟都深深印在了她的脑海中。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的明屋塔格山悬崖上，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也是中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20世纪初，先后有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探险队来到这里，劫掠壁画、雕塑等珍贵文物运到海外。

1992年到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工作后，赵莉通过调查测量，发现克孜尔石窟被揭取壁画的面积近500平方米，涉及59个洞窟。

2002年，赵莉到德国柏林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原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流失海外的龟兹石窟壁画等文物。她暗下决心：以后要重返这里，系统调查龟兹石窟壁画。

回国后，赵莉开始学习德语。2012年，她获得去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一年多时间里，她对馆藏的包括壁画在内的4594件新疆文物进行拍照、测量、记录，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文物库房里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为了赶时间，我往往从开馆后一直工作到闭馆前。”

2002年至2016年间，赵莉还到收藏龟兹石窟壁画的多个博物馆获取资料，共收集到8个国家20余家博物馆收藏的487块壁画的高清图片。

相比调查和收集资料，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原位更具挑战性。“有些被揭取的壁画边缘残缺严重，衔接不上；有些大幅壁画被分割成小块揭取，运到海外后重新拼接时错位，同一洞窟不同部位的壁画被错误拼接，不



同洞窟相同题材的壁画甚至被张冠李戴。在考证壁画原位后，我在电脑里将壁画照片进行裁剪，再重新排列组合。”赵莉说。

只有对每个洞窟了如指掌，做到胸有成竹，才能完成复原。从参加工作开始，赵莉白天上洞窟，晚上读佛经，“只有熟悉相关佛经，才能考证壁画内容内容的出处，把壁画和佛经对应起来，了解壁画里的世界。”

数不清在克孜尔石窟群跑了多少趟，在千疮百孔的洞窟里，赵莉对着壁画，在电脑里将一块块拼接错误的壁画图像拆分、组合，再重新定位。“要核对壁画图案是否吻合，尺寸是否合适，有些看着对了，过两天再一看，又发现不对的地方，只能重来。”

直到2020年，克孜尔石窟大部分壁画找到了原位，并进行了图像复原。赵莉将这些复原的壁画集结成《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出版，收录图版1200余幅，是目前为止收录克孜尔石窟流散壁画最全的大型研究性图集。“仍有40多块残片找不到位置，可能它们所在的洞窟壁画早已坍塌，永远也找不到原来的‘家’了。”赵莉难掩伤感。

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群的一部分。现在，赵莉已经开始另外两大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和森木赛姆石窟壁画的复原研究工作。“已经搜集到了200余幅高清图片。”赵莉说。